



引用格式:罗振.自发分工: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唯物史观草创的理论中介[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2):22-27.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2.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2-0022-06

自发分工: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唯物史观草创的理论中介

Spontaneous division of labor: Theoretical intermediary from practical materialis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罗振

LUO Zhen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关键词:

自发分工;
劳动;
实践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

摘要:马克思所面对的、贯穿其一生的现实性课题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运行机理的说明和对人类历史前途及其现实路径的指明。这一现实性课题是马克思贯穿其一生的研究,也是牵引其研究发展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个“完整的链条”的表达或者说明,都离不开自发分工这个重要的“理论抓手”。马克思的“问题”要依靠自发分工来推进,从自发分工出发可以看清唯物史观的建构过程。

[收稿日期]2019-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FZXB09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ZDJH-465);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罗振(1984—),男,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马克思在流寓巴黎期间,创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紧接着在布鲁塞尔,又创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从《手稿》到《提纲》,马克思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具象化为唯物史观。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使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在《形态》中具象化为唯物史观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明晰的说明,那么马克思思想行程的完整性将会发生“断裂”,即出现所谓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以及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断裂。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破解这个问题的呢?正如巴加图利亚所认为的那样,当马克思注意到分工问题时,唯物史观的制定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

一、问题的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断裂

一直以来,有研究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抽象的、不成熟的、意识形态化的,或者直接将其归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基于这种理解,唯物史观的历史形成就成了一个疑点。难道说,可以把唯物史观的形成归结于马克思的“灵光一现”?如果无法厘清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历史关系,势必会造成“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相互否定。

1. 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观化

把《手稿》和《提纲》中的马克思全盘地归入费尔巴哈的哲学境域,会导致人们自然地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这种对立有两种表现。

(1)肯定“青年马克思”思想,否定“成熟马克思”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过于强调哲学人类学维度

而忽视了唯物史观。《手稿》被发现之后,一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手稿》的哲学立场归结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且把《手稿》看作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巅峰,而其后的著作都被认定为是一种退化,用“青年马克思”来否定“成熟马克思”,进而产生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断裂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中,持此观点的还有马尔库塞、弗洛姆、弗兰尼茨等。

(2)否定“青年马克思”思想,肯定“成熟马克思”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主要代表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意识形态时期,后期是科学时期,前后思想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2]。《手稿》及其以前的马克思从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其理论体系依据于“人的本质、异化、异化劳动”概念。换句话说,“青年马克思”只不过是重复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一种后退。而等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形态》则奠基于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三个崭新概念的基础之上”^[3]。在阿尔都塞看来,唯物史观的创立曾经经历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然后突然等来了“豁然开朗”的一天,是一种前后无继承关系的奇迹般的“飞升”或者“突变”完成了唯物史观“思想整体”的发展。显然,这种单纯为了强化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做法,完全割裂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

2. 将唯物史观实证化

(1)自从唯物史观诞生以来,有一部分研究者将唯物史观定义为一种实证科学知识,并且指明其在方法论上主要依靠经验直观和对现实的描述。这一做法显然混淆了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界限。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唯物史观的典型代表就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他们大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且他们(普列汉诺夫除外)基本不重视甚至不关注

马克思哲学,最终他们的理论基本上陷入了实证主义、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泥淖。

其中,拉法格曾一度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考茨基从抽象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宿命式机械决定论”。与他们略有不同的是普列汉诺夫,他虽然关注到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但是他完全陷入抽象物质本体论,从而根本无法把握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与高度。拉布里奥拉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唯物史观,可是最终无可奈何地倒向了抽象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

(2)将唯物史观实证化的又一种表现是割裂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联系,如把《资本论》完全定性为“纯粹的技术性理论著作”。因为,《资本论》可以说是一本展开的唯物史观,它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是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具象化后的巨大丰富,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如果仅仅把《资本论》理解为一本经济学著作,只注重或只关心其中的技术性内容,就会面临西方学者的责难,即《资本论》已经“过时了”。

国外很多研究《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往往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学内涵进行分析。20世纪初,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了诘难。1950年代,吉尔曼对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统计检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70年代,科恩、布伦纳、罗默艾尔斯特等人,分别从技术决定论、财产关系决定论、理性选择论的角度,试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国内研究中也有所体现,突出表现在当代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以至于无法对话、无从对话,甚至相互隔离。

二、问题的症结:作为哲学范畴的“自发分工”理论环节的错失

分工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但是,大多思想家和研究者是从分工的经济性、抽象性、社会性、政治性层面来研究分工的。

1. 分工的经济学话语的绝对主导与分工的哲学话语的失语或遮蔽

(1)国内学者对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视野中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分工问题也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总体而言,学界对分工问题的研究有两大方向:其一,由于我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学界将视野集中在从经济学角度对分工问题进行考察;其二,学界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进行初步梳理,针对具体概念和问题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并且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中发生的具体问题。

进入新世纪,学者对分工问题的研究热度不断提高,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多。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研究;二是将马克思分工理论与现代经济学勾连起来讨论,或者用马克思分工理论来讨论经济问题。

(2)国外学者对分工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视野中

其一,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分工。法学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无疑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分工问题进行研究的大家,其专著《社会分工论》全面分析了社会分工的来源、作用,以及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涂尔干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来佐证其对分工的社会学研究:“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分工可以使工作日缩短。”^[4]英国著名思想家吉登斯通过对三大思想家马克

思、涂尔干和韦伯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关于分工的这样的结论:分工的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还应当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认为,应该从社会生产系统论的角度,高度重视社会分工理论。哈耶克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指出劳动分工应是社会秩序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其二,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分工。国外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分工进行研究的不胜枚举,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外经济学家都对分工进行过经济学方面的考量,从威廉·配第以来的经济学家都对分工有过论述。国外经济学家主要从分工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面对分工进行研究。查尔斯·巴贝奇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中,充分地论证了细致的分工对提高劳动效率的好处。泰罗不仅从理论上对分工进行过研究,还深入到生产实际对分工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研究。其分工管理的机制,被称作“泰罗制”。当然,也有一部分国外学者看到了分工给劳动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也都是建立在分工提高劳动效率的经济学分析之上,对分工提出了异议。可以说,从经济学视角考察分工,是国外学者的主流做法。

2. 问题的症结

经过初步的问题分析和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一是针对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研究,存在“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二是之前的研究把分工完全置于“经济性”的范畴之内。然而,问题的主要症结却全部集中在从哲学范畴来理解“自发分工”。

(1)“桥梁”的缺失: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到唯物史观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从《手稿》到《提纲》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原则之后,是如何在《形态》中展开唯物史观的建构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形成之后又用于研究什么呢?马克思在《提纲》中提示了一个思路:“从天国到人间”,

也就是说要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那么,现实的人的活动又为什么处于异化状态呢?无疑,分工理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分工理论这个“桥梁”,必然会出现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的断裂。

(2)问题的牵引:马克思一直以来是有自己的“问题域”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有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实践唯物主义确立了新哲学的出发点,“改变世界”为其指明了研究路向。《手稿》中的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即劳动是如何异化的?私有财产是如何演变成工业资本的?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唯物史观的草创,而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分工理论。另外,这两个问题又有同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原则,而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又具象化为现实的人的劳动。现实的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那么人类社会又是如何演进的呢?此时,又是自发分工理论出场了,马克思借其揭示了社会形态的演变。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马克思在《手稿》中也谈到了分工的异化性质,到了《形态》中,马克思赋予分工概念以历史性质。

可见,作为哲学范畴的自发分工理论,既是问题的重要“症结点”,也是通向问题解决的“桥梁”。

三、问题的破解:自发分工是贯通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理论中介

既然问题的症结已经发现,而且从两重角度与思路都已经发现“自发分工”的重要作用,那么,自发分工是如何成为这两个路径的核心“交汇点”的呢?第一个路径:马克思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原则之后,让空疏的原则获得丰富的内容。第二个路径:马克思受到自己问题的指引^[5],不断深入研究,以分工理论作为“抓手”,打开了问题的思路。无疑,自发分工理论是这两个路径的“交汇点”。

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确立之后,马克思是如何从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进入到现实经济生活的批判中的呢?毋庸置疑,没有分工这个理论“抓手”,空疏的哲学原则是无法展开为丰富的哲学内容的。同样,离开分工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的“遗留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恐怕《形态》中唯物史观也难以草创。

1. 分工理论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联结点

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本质性地开辟出全新的理论境遇。在哲学批判的意义上,感性活动揭示了实体与主体之原初关联的根据,即“实体即主体”的根据在于,作为感性存在的实体不过是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感性活动的,即实践的结构;在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它通过澄清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视域中的当下经济事实的现实实情,展示了劳动的本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3],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以及人类生存的现实根基。但是,在马克思还不能科学地回答异化劳动的根据、还不能在感性活动与异化劳动之间的断裂处找到现实的连接点的时候,感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就还只是空疏的。当马克思在出版《神圣家族》和《提纲》之后,在《形态》中以分工把感性活动与异化劳动连接起来的时候,感性活动就不仅空前巩固地成为人类历史的前提,而且此前更具哲学色彩的“感性活动”明确地具体化为“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一体的,因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而对这二者批判的成果就是感性活动、劳动的初步

呈现。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尚不能解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劳动是如何异化的;二是劳动创生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演变为私有制关系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对作为新世界观基础的劳动的呈现,还停留在哲学层面,尚未深入到经济现实的本质之中,由此就造成了所谓的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疏离。不过,经历了《提纲》之后,劳动的原则就被确立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紧接着,马克思借助分工理论的历史性展开,既回答了“遗留问题”,又将唯物史观初步建构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分工理论的出场,使得空疏的哲学批判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并共同展示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过程。换言之,正是由于分工理论地发现,哲学原则不再是空疏的原则,而是具有丰富现实内容的原则;也是由于分工理论地发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批判深入到了“历史最本质的一度中去了”。所以,从分工理论来看,不存在所谓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分工理论将二者衔接起来了。

2. 分工理论对《手稿》中“遗留问题”的解决就是唯物史观的草创

马克思在洞悉了全新哲学的根基(感性活动)之后,在《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劳动其实是异化劳动。进一步,马克思认为,我们可以像从异化劳动概念分析出私有制概念一样,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概念来重构国民经济学体系。这是马克思要完成的目标。也就是说,马克思准备科学地从“异化劳动”“私有制”这两个概念来阐明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但是,马克思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前提性的问题:工业资本的来历和异化劳动的根源。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两个前提性的问题的呢?面对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谈到人们经常在此陷入的“迷雾”: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循环论证。而

且更为普遍的结果是,人们往往出于理解的方便,从经验出发,把私有财产设定为异化劳动的根据。然而,当人们得出这样结论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马克思给出的提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6]166}那么,如果把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根据,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异化劳动的根据何在?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忽视了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本质关系的追问,最终导致理解上的巨大困难。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分工理论的出场,是破解这个问题的理论中介。马克思把分工概念从经济学范畴提升到哲学范畴,而且在作为哲学范畴的“分工”概念出场之前,就已经为其确定了一个历史前提,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6]519}。由此,感性活动如何演变为异化劳动的问题就即将得到历史性的说明。简而言之,就是自发分工导致了异化劳动,而且同时带来的还有相应的分配制度,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异化的分裂的交往方式,也就是所有制形式,由此,马克思就同时回答了私有制的来历。总之,分工只要是自发分工,就其作为一种活动而言,它就必然是异化的活动;而分工只要是自发分工,就分工活动(异化劳动)的结果而言,必然是私有制关系的产生。可以说,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共同母体”^{[6]778},产生了二者及其矛盾关系,而二者矛盾的解决,又转换为消灭分工的问题,直接衔接和表达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由此,产生的就是感性活动—分工—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消灭分工—共产主义的历史序列,也就是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当下人类历史。据此,马克思历史主义地分析了与分工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私有制关系的历史形式,并初步回答了在

《手稿》中提出的问题:依据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推导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同时,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追问资本关系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在《手稿》中给予分工以专门的关注,当然,此时的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分工的异化性质,或者说,是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待分工,而之后在《形态》中,马克思则赋予分工以哲学的高度,并以此为理论“抓手”,回答在《手稿》中遗留的前提性任务,并且以此来逐步完成同样在《手稿》中提出的研究目标,即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来重新规定国民经济的体系。随着对自发分工一系列问题的初步回答,马克思在《形态》中基本完成了唯物史观的草创。换句话说,唯物史观的脉络已经初步展示,而且,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原则也获得了丰富的内容,并且经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的逐步发展,直到《资本论》展示为丰富的唯物史观巨著。有鉴于此,我们以分工理论为“抓手”,不仅可以打通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也有力地回击了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的“断裂论”。

参考文献:

- [1] 巴加图利亚.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M]. 陆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35.
- [2]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0.
- [3] 吴晓明.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58.
- [4]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51.
- [5] 魏小萍. 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解读马克思的问题意识[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11):1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